

闽都文丛

丛书总主编：赵麟斌

闽都教育史

MINDU
JIAOYUSHI

薛 菁 翁伟志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闽都文丛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项目(2013年)——闽都文化人才培养与重点学科建设
课题编号: 5001010219-115001012008

闽都教育史

主 编 薛 菁 翁伟志
副主编 何连海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都教育史/薛菁, 翁伟志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2
(闽都文丛)

ISBN 978-7-301-26839-1

I. ①闽… II. ①薛… ②翁… III. ①地方教育—教育史—福州市 IV. ①G527.5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5143 号

书 名	闽都教育史 MINDU JIAOYUSHI
著作责任者	薛 菁 翁伟志 主编
责任编辑	吴坤娟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83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yjy@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923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88 千字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宋代以前的闽都教育	(4)
第一节 两晋南朝时期福州教育的萌芽	(4)
第二节 隋唐五代时期福州教育的发展	(5)
第二章 两宋时期的闽都教育	(11)
第一节 官学发展	(12)
第二节 书院勃兴	(18)
第三节 科举繁盛	(23)
第三章 元代的闽都教育	(29)
第一节 地方官学	(29)
第二节 书院官学化倾向明显	(33)
第三节 科举中落	(35)
第四章 明代的闽都教育	(39)
第一节 地方官学的兴盛	(40)
第二节 书院的曲折发展	(45)
第三节 科举中兴	(49)
第五章 清代的闽都教育	(56)
第一节 地方官学完备化	(56)
第二节 书院的发展	(64)
第三节 科举鼎盛	(72)
第六章 清末的闽都教育近代化	(77)
第一节 洋务教育	(78)
第二节 教会教育	(84)
第三节 维新教育与新式学堂	(96)
第四节 教育思想	(102)
第七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福州教育	(130)
第一节 教育行政的确立与变迁	(130)
第二节 各级各类学校的演变	(134)
第三节 教会教育的发展	(153)
第四节 学生运动	(159)

第八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福州教育(上)	(164)
第一节 教育行政的变迁	(164)
第二节 初等教育的整顿	(171)
第三节 中等教育的变革	(186)
第四节 职业教育的变动	(191)
第五节 师范教育的变动	(197)
第六节 高等教育的改造	(199)
第七节 社会教育的推广	(202)
第八节 乡村教育的开展	(209)
第九节 教会学校的立案与调整	(212)
第十节 学生运动	(218)
第九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福州教育(下)	(220)
第一节 抗战时期各县市制定措施促进学校发展	(220)
第二节 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	(224)
第三节 抗战后的福州教育	(243)
第四节 学生运动	(252)
结语	(255)
参考文献	(257)
后记	(264)

绪 论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类教导人、培育人的一种特有的社会活动,是传承社会文化、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基本途径。其产生于人类社会参与社会生活的需要和人类自身身心发展的需要,与人类的出现和社会的形成相伴而生。诚如我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在其著作《新教育大纲》中所言:“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不过人生的需要,随时随地有不同;教育的资料与方法也跟着需要有变迁。这种变迁的根源,就存在于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转易。”^①从历史发展看,教育经历了原始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阶段。据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境内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称“元谋人”,科学测定距今大约170万年前,因此,中国的原始教育即发端于170万年前。这种原始教育与当时原始社会生活的需要和人类自身生产的需要相应,其最大的特点是:教育与社会生产活动、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直接服务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没有专门从事教育的场所和人员,多数教育活动是分散的,是在生产劳动、社会生活中随时随地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教育内容以生活经验为主,包括生产劳动与生活习俗、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体格与军事训练等方面。所谓“燧人教民,以火以渔”^②“后稷教民稼穡”^③“其导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陆处者农”^④等古人传说即是明证。

氏族公社末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变革,推动了教育的变化,教育开始从社会生产、生活中分化出来,而文字的产生则促进了学校教育的萌芽。夏、商、西周学校教育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具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的开创。《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后人注解“校、序、庠”均为乡学,即小学;“学”为国学,即为大学。毋庸置疑,西周时期,中国的学校教育体系基本确立,教育职业、教育场所、教育设施、教育内容、教育系统等趋于规范。

战国以后,中国的学校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学校不但有官学,而且私学也大量涌现,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五代以后又出现了书院,唐代以后产生了最初的职业性的专科学校,如书学、医学、律学等,学校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渐趋完备。

① 《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页。

② 《韩非子·五蠹》。

③ 《荀子·解蔽篇》。

④ 《淮南子·齐俗篇》。

就福建而言,原始教育亦以福建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开始生活、生产之时为发端。据目前已有考古发现,早在 18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福建境内已有古人类居住,^①因此,福建的原始教育始于 18 万年前。福州地区迄今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考古资料表明,平潭壳丘头文化遗址是福州最早的文化遗存,经科学测定,其年代为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闽族”为当时的土著居民,故福州的原始教育当发源于七千年前。从总体上看,福州的教育迄至唐代以前都较中原地区和邻近省份的发展要落后,历来被视作文化不昌、礼仪未备的“蛮荒之地”,这是由于福州负山面海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福州远离京师,与发达的中原地区交往不便所致。如前所述,中原地区早在夏、商、周时期已经开创了学校教育,而福州乃至福建的学校教育则迟至两晋南北朝时期才产生,并且是伴随着中原汉族大举南迁入闽的进程产生、发展起来的。南朝刘宋时期,著名郡守阮弥之、虞愿、王秀之等创设学校,培养当地士子,闽都地区蛮荒落后的状态为之一变。唐、五代时期,福州地区得到全面开发,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学校教育因之迅速发展起来。唐朝后期,李椅、常袞的兴学活动,促进了闽都教育的长足发展。至宋代,闽都教育走向繁盛,出现“路逢十客九青衿”“巷南巷北读书声”的景象,整个福建地区在当时成为“东南全盛之邦”、人文荟萃之地。明清时期,闽都教育在经历元朝中落之后重获生机,迎来继南宋之后又一次教育的昌盛,出现了许多儒林佳话,如:明朝闽县林浦乡的林氏家族“三世为祭酒”“三代五尚书”;清朝闽县叶氏家族“五代进士”、陈氏家族“四代进士”等,为后世所传颂。迨及晚清,鸦片战争爆发,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马尾船政学堂和教会学校的创办,福州一举成为国内较早引进西式教育的地区之一,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

辛亥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改革传统封建教育和建设近代教育体系成为政府和民间共同努力的方向。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界向日本和美国学习,先后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成为民国时期办理教育的纲领性文件。福建省根据当时政府的政策法令,结合省内的具体情况对福建省的教育进行改造。福州作为省会所在,集中了较多的教育资源,学校数量较多,教育机构类型完备,是民国福建教育变革的一面“窗户”。

1912 年民国政府成立后,福州教育继续清末的近代化努力。其间虽有封建旧教育制度的一度复辟,但并不影响近代化的进程。北洋政府时期的福州教育发展主要受到时局的影响。由于军阀主政,教育得不到重视;连年的军阀混战,又使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福州的教育处于困境,未有明显进步。这个时期政府的教育政策比较宽松,对教会教育未加干涉。福州的教会教育发达,在民国成立后,教会学校建成从幼儿园至大学的教育体系。1919 年的五四运动使教育思想得到了空前

^① 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是福建迄今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经科学测定,其年代距今 18 万年前。(参见福建省博物馆、三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三明市博物馆:《三明万寿岩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福建文博》2002 年第 2 期)

解放,也使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福州也掀起“收回教育权运动”,促使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立案”。

1927年后国民党执政,十分重视发展教育。由于政局稳定,中央的各项措施得以有效贯彻。福建省各县都建立起稳定的教育管理机构体系,各级学校的教育经费得以保障。福州地区的各类教育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并逐步建立起多元化教育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利用设立实验小学、中心小学等制度推广义务教育,并通过设立乡村试验区等各项措施注意引导教育向农村倾斜。除了这些值得肯定的方面外,也有师范与高中分合以及高校的专业调整等需要反思的地方。这个时期,政府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学校内实行“党化教育”,另一方面也要求教会教育向中国政府“立案”,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

1937年抗战开始后,福州的各级教育仍继续正常进行,不过在教材内容里增加了抗战的内容;同时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参与动员和训练民众任务。从1938年下半年起,福州地区沿海的中等以上学校被迫迁往内地,各地的学校布局在无意中得到了调整,内地的教育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福州各学校在内迁之后,办学条件都有所下降,但师生们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努力学习与研究,保证了教学质量,学校的规模也有所扩大,为战后的社会全面建设储备了人才资源。

1945年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各校搬回原址,教育资源布局又一次发生变动,福州市区成为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此时福州的教育原本可以延续前期的发展,但内战的爆发,使社会经济崩溃,学校的发展缺乏资金,人事更替频繁,教育发展陷入停顿。

民国时期福州的教育是在曲折中发展,在近代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各种实践为现当代的福建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一章 宋代以前的闽都教育

第一节 两晋南朝时期福州教育的萌芽

两晋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永嘉之乱、侯景之乱导致大批汉族人南迁入闽,史称“衣冠南渡”或“八姓入闽”。入闽汉族人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文化教育,推动了福州教育的产生。诚如里人林诤在其著作《闽中记》所云:“自晋、宋文雅以来,教化丕变,家庠序而人诗书。”唐人杜佑《通典》卷182《州郡典·古扬州下》亦云:“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閻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有史可稽者,福州乃至福建最早的学校创设于南朝刘宋政权时期(420—479)。

据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名宦》卷1载:刘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河南光州人阮弥之任昌国(即晋安郡,今福州)太守,“昌国初为蛮地,俗不知学,弥之教稼穡,兴学校”,以至当时社会出现“家有诗书,市无斗器”的景象。

又,据《南史》卷70《虞愿传》载:“虞愿字士恭,会稽余姚人也……宋元嘉中,为湘东王国常侍。及明帝立,以愿儒吏学涉,兼蕃国旧恩,意遇甚厚。……出为晋平^①太守,在郡不事生业。前政与百姓交关,质录其儿妇,愿遣人于道夺取将还。在郡立学堂教授。郡旧出髯蛇,胆可为药。有遗愿蛇者,愿不忍杀,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还床下。复送四十里山,经宿复归。论者以为仁心所致。海边有越王石,常隐山雾,相传云‘清廉太守乃得见’。愿往就观视,清澈无所隐蔽。”因其为政廉平,身后郡人怀其惠,赞其德,建祠以祀。其后,王秀之(字伯奋,琅琊临沂人)为晋平太守,遗书朝士曰:“此郡承虞公之后,善政犹存,遗风易遵,差得无事”。^②

复又,乾隆《福建通志》(四库本)卷29《名宦》:齐时(479—502)东海(今山东郯城)王僧孺(与沈约、任昉同为当时三大藏书家)“为晋安丞,除侯官令”,建武(494—497)初始安王萧遥光为扬州刺史,奉诏举士,其荐表有曰:“前侯官令东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栖约,思致悟敏,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③

整体言之,两晋南朝时期福州教育尚处在初始状态,地方官学时续时断,若有

① 刘宋明帝泰始四年(468年),改晋安为晋平,即今福州。据清乾隆《福州府志》卷二《建置沿革》称:晋平郡之名,主要用于宋末齐初,也许只存在几十年。

② 《南齐书》卷53《虞愿传》、黄仲昭《八闽通志》卷36《秩官·名宦·福州府》所载略同。

③ 《梁书》卷33《王僧孺传》。

若无,并无定制,一般由地方官自行创办,因此,地方官员对教育的态度直接影响教育的发展。^①

第二节 隋唐五代时期福州教育的发展

一、隋唐五代时期闽都地区的开发

隋唐五代是闽都地区经济大开发、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战乱愈演愈烈,局势日趋恶化,南下避乱入闽的中原汉人遽增,再次掀起北方汉人入闽的高潮。^② 据史料记载,唐开元年间(713—741)福州有 31 067 户,^③ 天宝年间(742—755)则增至 34 084 户,75 876 口,^④ 至建中年间(780—783)达到 39 527 户,217 877 口。^⑤ 其时,福建省总户数为 93 535 户,口数为 537 472,仅福州一地就占人口数的 40%,福建的 11 个上县(唐代以户口多寡将州县分为上、中、中下三等,6000 户以上为上县,3000 以上为中县,不满 3000 为中下县),福州就占了 5 个:闽县、侯官、长乐、福唐、连江。^⑥ 人口遽增,一方面反映这一时期福州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促使福州经济向深度、广度发展。618 年,李渊代隋,建立唐朝。武德五年(622 年),唐将王义童平闽,任泉州刺史兼都督,开始了对福建的统治。福州作为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亦于此时期确立下来。随着唐朝对福建的开发由北而南全面推进,福建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也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李椅、常袞的兴学

福州是福建开发较早的州郡,早在两晋南朝,学校教育即已产生。隋唐以来,随着中原汉族大举南迁入闽,衣冠士人云集,对当地民智的开启和人文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与中原教育之盛况相比,福建地区则相对滞后。有隋一代,因州郡合并,福建唯设一州,即泉州,治所在闽县。因此,其时是否设立州(郡)学,尚未发现明文记载。迨及唐朝后期,李椅、常袞的兴学活动,在福州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关于福州府学(州学)设置的具体年代尚不可知,但据《三

① 福建省教育史志编写办公室:《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 6 辑,1991 年 12 月版。

② 从历史上看,中原汉人南迁进入闽都地区发生过三次移民高潮。第一次高潮是三国孙吴时期;第二次是西晋末年,永嘉“八王之乱”,中原板荡,江东衣冠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入闽;第三次是唐中叶“安史之乱”后和唐末黄巢农民起义期间,随王氏入闽者多达三十六姓。

③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4 页。

④ 《新唐书》卷 41《地理志五》。

⑤ 杜佑:《通典》卷 182《州郡》12。

⑥ 杜佑:《通典》卷 182《州郡》12。

山志》^①《八闽通志》^②所载,可以断定福州府学当在大历年间(766—779)以前设立。至于李椅、常袞兴学活动,史载较详。

李椅^③福州兴学主要依据与其同时代文人独孤及所撰《福州都督府新学碑记》。该《碑记》载:李椅,唐宗室,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冬十一月任御史大夫持节都督福、建、泉、漳、汀五州(即福建全境),大历十年(775年)秋九月逝于任上。李椅在福建的三年,崇学校,励风俗,将兴办教育作为第一要务。他始至福州,“未及下车,礼先圣先师,退而叹堂室湫狭,教学荒坠”,“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栋宇,盛其俎豆”。为筹集资金,李椅“躬率群吏之稍食,与赋刑之余羨,以备经营之费,而不涸于民也”。学宫依据中原地区的模式建造,“先师寝庙、七十子之像在东序,讲堂、书室、函丈之席在西序,齿胄之位,列于廊庑之左右”。李椅还亲临学宫,“以《五经》训民。考教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者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竞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由是海滨之人,以不学为耻,州县之教达于乡党,乡党之教达于众庶矣”。李椅的兴学活动为时人称颂:“易俗移风,经始黉宫。百者皆兴,孔堂崇崇。……我闻我里,讲论资始。比屋为儒,俊造如林,纓胡之纓,化为青衿”。在他逝后,“群吏、庶民、耆儒诸生,雨泣庙门之外,若有望而不至。号曰:‘岂不欲斯文之渐渍于东瓯之人欤?不然,何锡厥化,而不遐公之年也?吾党瞠然,呜呼!曷归。’”^④

李椅之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前宰相常袞任福建观察使,再次展开兴学活动。常袞,“京兆人,天宝末及进士第。性狷洁,不妄交游。由太子正字累为中书舍人。文采赡蔚,长于应用,誉重一时”。大历十二年(777年),常袞“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弘文、崇文馆大学士,与杨绾同执政”。这是常袞政治生涯中的巅峰时期,常袞亦成为常氏家族中唯一担任过宰相的人。“建中初,杨炎辅政,起为福建观察使。始,闽人未知学,袞至,为设乡校,使作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钩礼,观游燕飧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赠尚书左仆射。其后闽人春秋配享袞于学官云”。^⑤对此,《新唐书》卷203《欧阳詹传》亦载:“及常袞罢宰相为观察使,始择县乡秀民能文辞者,与为宾主钩礼,观游飧集必与,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劝仕。”常袞因此被后人尊奉为“兴闽文学之圣人”。常袞去

① 《三山志》卷8《公廨类·庙学》:“庙学,旧州西北一里,唐大历七年,观察使李椅移城南。”编者按:“李椅”疑是“李椅”之误。

② 《八闽通志》卷44《学校·福州府》:“府学在府城南兴贤坊内。旧在子城西北一里许,唐大历间,观察使李椅移建今所。”

③ 李椅,《旧唐书·代宗本纪》作“李琦”,“(大历)七年十一月甲申,以福建观察使李承昭为礼部尚书,华州刺史李琦为福州刺史、福建都团练使”。(《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

淳熙《三山志》作“李椅”。《闽中记》云:“李廊公椅,大历中,廉按比部,乃大启府学,劝诱生徒。”《重修学记》作“李椅”。考之《唐书》,李椅未尝有廊公之称,亦未尝官福州,《新唐书》李椅入《叛臣传》。(见《新唐书》卷224《叛臣·李椅传》)据此,李椅与李椅当不是同一人,似当以《学记》为正。

④ 徐景熹:乾隆《福州府志》卷11《学校·府学》。

⑤ 《新唐书》卷150《常袞传》,《八闽通志》卷36《秩官·名宦》略同。

世后,其子常遂为永泰县令,葬其父于方广山之麓,墓前神道碑刻:“唐闽观察使常公墓道”,其墓被尊称“圣人墓”。

为感念常袞的恩德,闽都乡人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自发捐资重修常袞墓。长乐人林宗泽撰写了《唐福建观察使常袞墓志铭》,这方青色页岩碑刻藏于今永泰县方志办。其文曰:

常公者,京兆人也。以天宝进士仕于朝,代、德二宗,天下翕然称贤,其载在唐史者可考。其以故宰相观察福建也,设乡学,延名师儒以教闽人,闽人始知向学,海滨邹鲁之风,实开于此,其载在郡、国志者可考。公卒于闽,朝廷追赠尚书左仆射,适嗣遂公适宰永邑,葬公葛岭之阳,因而卜居连邑,为望族焉,其载在家乘者又可考。公之坟方圆七十三丈有奇,环以短垣,垣之内,旧植松树四十余株,森森拱庇,盖自有明以来已然矣。我朝雍正六年奉谕重修,迄今百余载,春霜秋露,曷胜宿草之悲!公之裔孙肇端,常欲葺而新之,永之绅士以为公之有功于闽,既已专祠府学,以志不忘,矧其一抔在永,可弗知所爱护乎?于是相与怂恿,捐资鸠工砌造,弃石用灰,规制一整;并拓墓前余地,建年表一,勒“兴闽文学”于上。用钱二百余贯,三阅月而成。成而问志于予,予维公之功名节义;在朝廷者,史既书之;其在闽者,口碑千古,亦不得表而明。所幸者陇阡在永,永之人,独得以伸其瞻仰之情矣,然而斯径之成,永之幸也,抑岂独永之幸也!是为志。道光十有三年,冬十月,后学长乐林宗泽撰。后学闽县方嵩书。

李、常二人的兴学活动,使得福州“俗初奋于学”,^①“贞元、元和间,学者益盛”,^②为宋代闽都教育的繁盛奠定了基础。如《八闽通志》卷44《学校》之“序言”云:“按旧志,莆人郑露倡学于梁、陈之间,福人薛令之登第于神龙之际,则闽人知学其所由来也远矣。而《唐史》则谓常袞兴学校,而闽人始知学,何欤?盖闽人知学虽已久,至袞大兴学校而始盛也。自时厥后,闽之文物駸駸与上国齿,至宋遂有‘海滨邹鲁’之称。”明吴宽《重建文庙记》亦云:“闽去中州万里,在《禹贡》荒服之外,历三代至汉,其民既庶,复徙之江淮间,益久而生息复盛,然未知以文学为事也。在唐常袞为观察使,始设学校,教之为文,又能屈己以倡率之。于时,士子更相慕效,而文学大兴,其人遂与中州等。学校之设,其有益于天下如此。”^③

除了府(州)学的设立,还设有县学。《八闽通志》卷44《学校·福州府》:“长乐县学,在县治东兴贤坊内。唐乾符四年建。”

三、王氏闽国时期教育发展

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和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导致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大批北方移民南迁进入福州。唐景福二年(893年),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字信臣)、王审知

① 徐景熹:乾隆《福州府志》卷24《风俗》。

② 梁克家:《三山志》卷8《公廨类二·庙学》。

③ 徐景熹:乾隆《福州府志》卷11《学校·古田县学》。

(字信通)兄弟占领福州,王潮自称福建观察使,各地武装纷纷归附,唐王朝遂正式授予王潮为福建观察使。乾宁三年(896年)福州升为威武军,唐昭宗以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加检校尚书、左仆射,王审知为观察副使,二人正式据有福建之地。次年,王潮病卒,王审知自称“福建留后”。不久,唐朝廷授王审知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朝灭亡后,后梁太祖朱温(又名朱全忠)加授王审知为中书令,旋又封其为闽王。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王审知去世,其长子王延翰继位,于后唐天成元年(926年)建大闽国,自称国王,定都福州。从此,闽都地区又进入了政治上动荡不安的时期。由于王氏兄弟纷争,内讧不已,最终发展成内战,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为南唐所攻灭,闽国亡。史称此期为五代闽国时期,亦即王氏闽国时期(893—945)。

这一时期,由于大批中原文人儒士躲避战乱流寓福州以及王氏政权采取礼贤下士、兴文重教的政策,福州教育于此期有了较大发展。清人陈云程的《闽中摭闻》卷1《八族入闽》中记载:“王氏据有全闽,虽不知书,一时浮光士族,与之俱南。其后折节下士,开四门学,以育才为急,凡唐宋士大夫避地而南者,皆厚礼延纳,作招贤院以馆之,闽之风声气习,浸与上国争列。”^①诚如清末同光派诗人陈衍在其《补订〈闽诗录〉叙》中所言:“文教之开,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日益盛。”

乾宁元年(894年),王潮入闽后“乃作四门义学,还流亡,定赋敛,遣吏劝农,人皆安之”。^②

乾宁四年(897年)王潮病卒,审知代立。王审知继任后,“为人俭约,好礼下士”^③“招贤下士有吐哺之风”,于福州设招贤院,广纳人才,延揽中原文学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杨沂,唐相涉从弟;徐寅,唐时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仕宦”。^④由于王审知“怀尊贤之志,宏爱客之道”,使得“四方名士,万里咸来”,^⑤并感到“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⑥

为培养人才,王审知号召各地“广设庠序”“以学校之设,为教化之原”,使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僻村间有私塾;又采纳翁承赞的建议,“建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四门学规格较府州学为高,面向平民开放,并延请知名人士陈郟、黄滔等人担任“四门博士”教导学生,“令诱掖童蒙,兴行敬让。幼已佩于师训,长皆置于国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乡校皆游,童蒙来求,雅道靡靡,儒风优优”。^⑦宋人钱昱在《重修忠懿王庙碑》盛赞王审知兴文重教之功绩,曰:“兴崇儒道,好尚文艺,建学

① 徐晓望:《福建通史》第2卷《隋唐五代》,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② 《新唐书》卷190《王潮传》。

③ 《新五代史》卷68《王审知传》。

④ 《新五代史》卷68《王审知传》。

⑤ 徐景熹:乾隆《福州府志》卷14《坛庙一·忠懿王庙》。

⑥ 黄滔:《黄御史集》卷5“丈六金身碑”。

⑦ 徐景熹:乾隆《福州府志》卷14《坛庙一·忠懿王庙》。

校以训海,设厨饌以供给。于时兵革之后,庠序皆亡,独振古风,郁更旧俗,岂须齐鲁之变,自成洙泗之乡。”^①

四、科举初兴

州、县学的设立,推动了福州教育的发展,其突出表现就是及进士第的人数有明显增加。众所周知,入隋以来,科举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的选士制度,教育也服务于科举考试,因此科名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高低。福州“自唐神龙迄后唐天成二百二十有三年,擢进士者三十六人”。^②然,细考诸方志,实得43人,兹列表如表1-1所示。

表 1-1 福州唐代进士科名表

姓名	及第时间	籍贯	资料来源
薛令之	神龙二年(706年)	长溪	《三山志》
陈通方	贞元十年(794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陈翎	贞元十三年(797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邵楚苕	贞元十五年(799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陈颜博	元和五年(810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陈去疾	元和十四年(819年)	侯官	《三山志》《八闽通志》
欧阳袞	宝历元年(825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林简言	大(太)和四年(830年)	福清	《三山志》《八闽通志》
侯固	大(太)和九年(835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李滂	开成三年(838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萧膺	开成三年(838年)	侯官	《三山志》《八闽通志》
林鷗	开成三年(838年)	长乐	《闽书》、道光《福建通志》
郑诚	会昌二年(842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林滋	会昌三年(843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陈纳	会昌四年(844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陈鏞	会昌四年(844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林勛	大中元年(847年)	侯官	《三山志》《八闽通志》
侯岳	大中十二年(858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薛承裕	咸通二年(861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王榮	咸通二年(861年)	福清	《三山志》《八闽通志》
欧阳琳	咸通七年(866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连总(摠)	咸通九年(868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欧阳玘	咸通十年(869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林慎思	咸通十年(869年)	长乐	《三山志》《八闽通志》
陈浈	乾符二年(875年)	侯官	《三山志》《八闽通志》
郑隱	乾符二年(875年)	福清	《三山志》《八闽通志》

① 徐景熹:乾隆《福州府志》卷14《坛庙一·忠懿王庙》。

② 梁克家:《三山志》卷26《人物类一·科名》。

续表

姓名	及第时间	籍贯	资料来源
林嵩	乾符二年(875年)	长溪	《三山志》
林微	乾符二年(875年)	长乐	《闽书》
陈蜀	乾符五年(878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倪曙	中和五年(885年)	侯官	《三山志》《八闽通志》
林衮	大顺元年(890年)	闽县	《三山志》《八闽通志》
张莹	大顺元年(890年)	连江	《三山志》《八闽通志》
陈鼎	大顺二年(891年)	福清	《三山志》《八闽通志》
黄璞	大顺二年(891年)	侯官	《三山志》《八闽通志》
曹愚	景福二年(893年)	长溪	《三山志》
黄诜	乾宁二年(895年)	侯官	《三山志》《八闽通志》
沈崧	乾宁三年(896年)	闽县	《三山志》
翁承赞	乾宁三年(896年)	福清	《三山志》
卓云	乾宁四年(897年)	长乐	《三山志》《八闽通志》
翁承裕	光化三年(900年)	福清	《八闽通志》
郑希颜	天复元年(901年)	闽县	《闽书》
柯崇	天复元年(901年)	闽县	
何瓚	唐末	闽县	《闽书》《新五代史·何瓚传》

上述进士及第人员中存疑者三人：一为翁承裕明经及第为进士及第，《八闽通志》卷46《选举·科举·福州府》翁承裕下注云：“福清人。按《莆田志》，承裕于是年明经释褐，而《寰宇志》以为裴格榜，恐误。”二为林勛“大中五年开元礼登科”为进士及第。《三山志》卷26《人物类一·科名》林勛下注云：“字公懋，闽县人。大中五年，开元礼登科。终吉州刺史。”三为黄诜登拔萃科为进士及第。《三山志》卷26《人物类一·科名》黄诜下注云：“字仁泽。登拔萃科。璞之子。终左宣义郎、节度巡察判官。”

从上述进士及第情况看，福州教育在唐朝中后期有明显进步，但从整体上看，福州教育仍落后于中原地区，据统计，终唐之世全国录取进士共6642人，^①福州尚不及1%。

由于五代时期中原战乱频仍，闽人北上参加科考不便，故此期及第进士唯陈保极一人。《三山志》《八闽通志》俱载：陈保极，闽县人，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及第。

^①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第二章 两宋时期的闽都教育

960年,后周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在“主少国疑”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夺取了后周政权,黄袍加身,登上帝位,定国号为“宋”,史称北宋。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下,攻占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北宋灭亡。次年,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宋旧臣拥立下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当年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赵构建立的宋朝为南宋。1279年,南宋为元兵所灭。北、南宋存在320年,史称两宋。两宋是中国文化教育、学术思想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理学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鉴于唐末、五代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称雄的弊端,宋朝统治者摒弃原来的“武功”转而“文治”,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一如宋太宗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谓近臣曰:“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①这对宋朝教育事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总体言之,宋朝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沿袭唐制。学校教育在三次兴学后迅速发展起来,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史载:“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②教学内容依旧强调儒家经学教育,所选用的人才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宋真宗(998—1022年在位)还亲自到曲阜拜祭孔子,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称孔子为“人伦之表”、孔学为“帝道之纲”,并以《十三经》作为学校的法定教材。

两宋时期,闽都地区的经济发展达于繁盛。北宋末年,宋室南迁,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原士庶纷纷南下入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发达的文化教育,推动了闽都地区经济、文教事业的发展。正如朱熹在《跋吕仁甫诸公帖》中所说:“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使得福州教育在唐末五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至南宋达于繁盛。张宁在《谕除知福州府到任表》中说:“忆昔瓯粤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徐景熹《福州府志》卷24《风俗》亦云:“至宋朱子绍濂洛嫡传,福郡尤多高第,弟子阐明圣道,弦诵互闻。盖向之习染,悉湔洗无留遗矣。自兹厥后,风气进而益上,彬彬郁郁,衣冠文物之选,遂为东南一大都会。古所称海滨邹鲁,至今日而益验矣。”蔡襄《福州修庙学记》亦云:“七闽滨海,其地险而壮。

① 《续资治通鉴》卷11。

② 《宋史》卷155《选举志三一》。

福州之治尤据其胜势,为东南一大都会,其风俗尊向儒术。”^①这一时期,福州教育的繁盛主要表现在官学发展、书院勃兴、科举繁盛等方面。

第一节 官学发展

一、州县官学^②的发展

福州州县官学的发展主要是在北宋三次兴学高潮之后。“庆历四年(1044年),诏诸郡置学,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若民力未给,许姑就孔子庙,或系官屋宇。于是建学者始众。然教养规约,人自为之,职事、生员,大率略具尔。至崇宁初,行舍法,乃诏学置学长一人,学谕一人。学长掌一学之事,学谕以经术训导诸生。委州知、通、教授,选老成有行艺为闾里所推服者,各给俸禄,县以下系省杂收钱充。诸生在学一年,从学长、学谕考选,以报令佐审验,升州学。仍置小学,择可为教谕者。十岁以上,愿入学,听之,惟倚郭县皆不置。时学各增建斋宇,逮舍法罢,重以兵火,圯坏者相继。后率更创,犹有旧制焉。”^③有宋一代,福州除府学外,所辖各县均设学,兹据《三山志》《八闽通志》所载详述如下:

福州府学,在府城南兴贤坊内。旧在子城西北一里许,唐大历七年(772年),观察使李椅移建今所,始补生徒三十。唐乾宁元年(894年),王潮于州四门置义学。五代梁龙德元年(921年),王审知置四门学,以招徕四方之秀。吴越时(947—978)作新宫,号使学。宋太平兴国(976—983)中,转运使杨克让始作孔子庙。景祐四年(1037年),权州事谢微表请于庙立为府学,从之。诏下,微适罢去,郡守范亢、许宗寿踵其事,历五年乃成,糜公帑钱千万。植宇六十楹,中设孔子与其徒高第者十人像,又绘六子及先儒以业传世者于壁。有九经阁、三礼堂、黉舍、斋庐、旁翼两庑,庖次井饮,百用皆给。康定二年(1041年),沈都官邈增赐田,延旧儒敷讲经术,乃立课程,要束,以示学者。熙宁三年(1070年)灾。郡人韩昌国、刘康夫等二百人请自创建,郡守程师孟许之。既而属县之士皆如昌国请,不一月,集钱三百万,为门,为殿,为公堂,环列十斋,以居学者。公堂之后,又别为室以藏书,为堂以讲议,为斋以处师友,盖合百有三十间。自孔子以下至十哲,塑像冕服,更请制度,自朝廷颁降。然自是以以前,养士岁才十数人,元丰(1078—1085)初,始增至数十。元祐八年(1093年),郡守王祖道复斥东西序之北二百四十尺,增斋舍为二十。而小学在中门外之左,客次在中门外之右。旧庙学门皆西出,至是改建外门,直中门之南,岁补生员五百。崇宁元年(1102年),行舍法,始自朝廷选择教授增养士之额,益广为

① 徐景熹:乾隆《福州府志》卷11《学校·府学》。

② 宋代地方行政机构为三级:第一级为路;第二级为州、府、军、监;第三级为县。一般而言,路不直接设学,仅置学官管辖所属各学校。因此宋代地方官学只有两级,即州学(府官、军学、监学)和县学。

③ 梁克家:《三山志》卷9《公廨类三·诸县庙学》。